



思想者营地

诗歌的魅力

周进军

前段时间,在《今日头条》上读到一篇署名“三人随笔”的文章,题目很长,《〈诗刊〉发表的这首诗,到底好在哪里?有评论也不明白》。我好奇心很重,于是仔细拜读了全文。还不够,连后面“热心人”的跟贴也一一不落。数了一下,当时跟贴有125条之多。

“三人随笔”的文章,传达出三个信息。其一,粘贴《诗刊》发表的邵东诗人李春龙的新作《万亩是一种谦虚的说法》,质疑这首诗“到底好在哪里”;其二,粘贴著名文艺评论家、文学博士吴投文的简短评论,质疑吴博士“几乎啥都没说”;其三,质疑《诗刊》,为何入选这类诗,“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信服?”

这时,我立马想到十多年前,即2009年,让一直波澜不惊的诗歌界热闹起来的那件事。针对云南诗人雷平阳《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》的诗作,网上数以百万计的人加入了或批判或赞赏的评论队伍。后来《羊城晚报》据此发起“寻找诗歌”的系列活动,掀起了一场“全民式”诗歌讨论风暴。很多人因此记住了云南的兰坪县,记住了澜沧江在兰坪县的三十七条支流,无疑也记住了诗人雷平阳。

说雷平阳,就是为了说李春龙。在我的记忆中,李春龙写乡土诗,比雷平阳更早。他写诗的风格与雷平阳有相似之处,情感离不开对故乡深沉的爱,故乡大兴村在作者心中有写不完的话题。但又不同于雷平阳,李春

龙写出的诗更具特别的辨识度。

回过头再来读李春龙《万亩是一种谦虚的说法》一诗。前半部分是叙事写景,铺写故乡天福岭几十座山上的野生鹿角杜鹃,十分绚丽,“绝对的女一号”。“春风起处,漫天白色粉色衣袂飘飘”,想象力极佳。“白色粉色”既是对杜鹃花的写实,又把春天盛开的杜鹃花和身穿艳丽衣裙的美女赏花联系起来,一幅颇为壮观的乡村“闹春图”鲜活而生动。

后半部分是抒情。“双凤的野生鹿角杜鹃/都集中在天福岭”,漫山遍野,让人目不暇接,才有了“万亩是一种谦虚的说法”。诗人走一程看一程,欣赏家乡的美景,心里眼里都是喜悦。“春光拂照,光影何止十万亩”,春光无限。你看吧,“香气弥漫,覆盖面积何止千万亩”,用夸张手法,描绘春光中的杜鹃美景,将情感升华,抵达高潮。按评论家吴投文的评论:“草木只是一种寄托,而爱之切才是最真实的,最持久的。”

吴投文在《关于新诗标准》中有一段文字:“一首诗如果不能使人感动,就不能称其为诗。因为现实意义上的优美并不等同于古典意境和意象的美,新诗之美有更为复杂的意义维度和审美维度。”最后我想说的是,李春龙应该感谢“三人随笔”,让更多诗歌爱好者读到了这首《万亩是一种谦虚的说法》。诗自然是好诗,仔细品读,既觉得真诚,又叫人感动。

(周进军,邵东作协会员)

品茗谈文

朱熹问“渠”

陈扬桂

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朱熹一生致力于讲学授徒、著书立说,他的著作之多,令人叹为观止。其著作中,诗歌占的分量虽然不多,却不乏富有哲理、启人深思的佳词丽句,如“少年易学老难成,一寸光阴不可轻”“问渠哪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等等。

朱熹的诗句晓畅如话、通俗易懂,但有些诗句正因为他是用当时、当地的大白话写的,而让读者费解,如“问渠哪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句中的“渠”,就常常被人弄错意思。相当多的读者把这两句诗译成:“借问水渠中的水怎么这样清,还不是因为源源不断有活水流进来。”笔者在校读《邵阳文库》书稿时,发现一位知名学者也是这样译的。这样译,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,所表达的意思也是清楚明白的。但是,要知道朱熹在这里所问的到底是水渠,还是其他?我们必须弄懂“渠”在诗中究竟是什么意思。

朱熹是江西婺源人,在赣方言及吴语、粤语、客家话中,“渠”同“佢”,是第三人称代词。如:渠是何人?意思是:他是谁?诗人在诗中问的是“它”,而不一定是“水渠”。那么这个“它”所指代的是什么,就得去读全诗了。

“问渠”出自朱熹的《观书有感》,全诗是:“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

共徘徊。问渠哪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从前两句来看,我们知道朱熹所问的是那口“半亩方塘”,而不是问“水渠”。“问渠哪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的意思是:这塘中的水为何如此清澈呢?那是因为源头总有活水不停地流下来。

《观书有感》是一首借景喻理的名诗,被后人广为引用。全诗以方塘作比,形象地表达了一种微妙难言的读书感受。池塘并不是一泓死水,而是常有活水注入,因此像明镜一样,清澈见底,映照着天光云影。这种情景,同一个人在读书中获得新知、提高认识时的情形颇为相似。所谓“源头活水”,是指从书中不断汲取新的知识,每次读书总有新领悟,就像有源头活水来,其乐无穷,激励人们要博览群书,精研学问。人们也用这两句诗来赞美一个人的学问或艺术的成就,自有其深厚的渊源。

我们也可以从这首诗中得到启发,只有思想永远活跃,以开明宽阔的胸襟,接受种种不同的思想、鲜活的知识,广泛包容,方能才思不断、思想常新。这两句诗已凝缩为常用成语“源头活水”,用以比喻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。

(陈扬桂,隆回人,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)

闲话《五牛图》

易祥茸

中国古代名画很多,但我最喜欢的是《五牛图》。

《五牛图》在中国绘画史上至少有两个第一:它是现存最古老的纸本中国画,是中国古代帝王文人题跋最多的名画。《五牛图》的作者是唐代的韩滉,他绘此画时,正在唐德宗的宰相任上。

韩滉和许多上层人物一样,每有闲暇,便挥毫绘彩,以表胸意。有一天,难得一个好天气,他出外郊游。瞥见一群黄牛散布在旷远的草地上,有的认真埋头吃草,有的懒卧晒太阳,有的回头舔舐皮毛,有的荆丛摩痒,有的追逐戏耍……这样和生动的一幕,让韩滉立刻来了兴致。他从随那里取来笔墨,把这些牛的千姿百态一一写生下来。写生得来的东西,它还不是画,顶多算是绘画创作的资料。韩滉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立意、构思,便在一张184cm×28cm的麻纸上平直画上了5头牛。几乎没衬什么背景,倒是5头牛的变化形态,使画面生动了得。

左起第一头,双角朝前微翘,四蹄稳重分立,皮毛皱褶,骨架清晰;第二头,毛色略浅,头部向后扭转,似在伸舌舔舐,小耳挺立,配以蜿蜒双角,珊珊可爱;第三头,是唯一正立之牛,牛角撇两边,腿蹄并整齐,口鼻精致,憨厚端庄;第四头和第五头,一是黑白皮毛,咀嚼中低处植物,一是钝角下垂,在荆棘处摩痒。但是,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:双眼

略有夸张,眸里透着灵光;除第三头正对观者外,其余虽姿态万千,但头的朝向却出奇一致。

五牛绘于纸上,看似静态,其实却活泼生动。但作者究竟要表达什么主题呢?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

有人认为,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,而韩滉又是当朝宰相,连画五牛,表明他重视农业,鼓励农耕;有人认为,牛有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、驯服温顺的品质,作者画牛,就是要表达自己的忠贞品质。甚至有人认为,五牛出自宰相手笔,且有皇帝题跋,必有仙魂相附,于是便将五牛分别命名为福牛、禄牛、寿牛、禧牛、财牛,把它和富贵吉祥、平安如意关联在一起;或命名为拓荒牛、好运牛、招运牛、旺家牛、如意牛,将它与风水、祈福、开运融为一体。这就把画的主题想得有点玄妙了,或者说是公然将画作“为世俗所用”。

其实,画作的主题还有另一说法:那就是韩滉有五兄弟,而作画时,只有他一人活动在官场,其余四人都闲云野鹤,生活安适。但是,他们的大方向完全一致,思想紧紧与这位当宰相的兄长保持一致——忠于德宗皇帝,忠于大唐王朝,这是在向皇帝表忠心。

这幅画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,乾隆观画后大有感慨,欣然在正中间那头牛的上首题诗:“一牛络首四牛闲,弘景高情想象间。舐齧詎惟夸曲肖,要因问喘识

民艰。”乾隆从五牛想到统治阶级高层,再想到民间,说不定这幅画对他以后治理国家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从绘画的角度看,现代的黄胄画驴、徐悲鸿画马、李可染画牛、刘继卣画猪,都传承了韩滉的国画笔风。

我还听我大哥说过,他也非常欣赏这幅画。因为大哥也有五兄弟,他也是老大。大哥虽为一介小小公务员,但带领兄弟几个过好日子也是他应有的职责。从此,他就时时以“五牛”韩滉为榜样,带领兄弟们勤劳温顺,负重前行。

图上五牛虽然“闲适”,但是《五牛图》的流传却不平凡。清代以前,它一直在宫中流传。1900年,八国联军进攻北京,劫走了《五牛图》,从此该图下落不明。20世纪50年代,香港企业家吴蘅孙的集团破产,决定将在海外购得的《五牛图》拍卖。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个消息后,立即指示文化部派团队前往香港,先是鉴定真伪,然后不惜高价拍回,现存故宫博物院。

国宝回家了,随之而来的是仿制品也多了起来。有一次,儿子去广州出差,在一个工艺品门市部看见了一幅装裱精美的铜版《五牛图》。他知道我曾多次念叨过《五牛图》,尽管价格不菲,但他还是买了下来。拿回来后,我立刻将它摆放在书桌的右上方,以便能朝夕观瞻。

(易祥茸,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)



群山

郑国华 摄

史海钩沉

南宋湖南提刑潘德廊

阿旧

嘉庆《武冈州志》载,淳熙十三年(1186)潘德廊提点湖南刑狱,“闻潭州梁脱肆劫杀士”。之前官员审查未明,而潘德廊只经一次过堂便厘清了案情,放了无辜嫌犯“梁脱肆”,由此暴得大名,被公认为是堪当大任之人。那时,武冈一年收押犯人三十八名,而被判死罪的就二十八人,潘德廊勘得实情,“皆平反之”。潘德廊又把此事上报给朝廷,而当时他已“擢知广州”了。皇帝因他“究心刑法”,特地给他晋职增俸以示嘉奖。

以上与南宋李心传的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中所记稍有出入。李心传记称,潭州有控告“梁晚四劫杀商人”案,被告多次翻供,历七次审理案情仍不能明。淳熙十二年(1185)潘德廊提防湖南刑狱,“一问得实”,放了无辜者“梁晚四”。后面有关潘德廊在武冈平反被判死罪犯人并受嘉奖等事,与州志中所记一致。

但李心传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又与朱熹《晦庵集》中所记有异。《晦庵集》中称,潭州有盗贼杀了人,“而诬指贾人梁晚四为罪首”,其罪当

诛,“前后七推具伏”。但一到省察甄别囚人的阶段,梁晚四又反悔不认罪了。最后潘德廊亲审,查知死者被害的时候,梁晚四“实在他所”,判定这是起冤案,便放了梁晚四,后缉得真凶,又“劾官吏失入者”。皇帝大喜,深表认可。潘德廊又上奏,条陈冤狱多是因“新法狱”之弊端,新未必如旧,“请得复用旧法”,皇帝“亦可之”。

《晦庵集》中所记来自朱熹为潘德廊作的《直显谟阁潘公墓志铭》。朱熹和潘德廊为姻亲,有深交,其记述详明,当最可靠。由此看来,州志所记“梁脱肆劫杀士”中的“梁脱肆”,实为梁晚四。梁晚四本人是商人,而李心传误其“劫杀”的“士”为商人。梁晚四,是数字名,数字名在宋代很常见;“晚”,为其在兄弟中的长幼排行,相当于“伯仲叔季”中的季。今湘语称呼父辈兄弟中排行最末者为“满满”,其正确写法实为“晚晚”。

据朱熹《直显谟阁潘公墓志铭》、黄宗羲《宋元学案》和《上虞县志校续》等文献,潘德廊名畴,字德廊,婺

州金华县人。畴,古同“畴”,故而潘畴一作“潘畴”。黄仲昭《八闽通志》载:“潘畴字德廊,金华人。”淳熙四年(1177),潘畴于上虞之五夫清风峡创建月林书院,曾邀请朱熹讲学于此。《大清一统志》载其事,亦作“潘畴”。潘畴曾知潭州和任湖南路安抚使,朱熹《直显谟阁潘公墓志铭》亦有提及。《湖广通志》载,宜章有野石岩,“在县北十五里,临官道,湖南帅潘畴书野石岩三字于上”。

潘畴为人聪明强健,断狱如神,刚直严明,畏吏服之。汉唐以来,湖南向为官员贬谪之地。宋室南迁后,湖南的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发展,地位得以提高,但在传统眼光里仍是蛮夷之地。因而潘畴知潭州时,好友陈傅良在《潭州潘德廊生辰》中认为他流落南土,遭受不公,很为他抱不平。但潘畴不以为意,恪尽职守,勤政爱民,在湖南为官期间,很有政绩。除上面记载的平反梁晚四和武冈死囚外,朱熹《直显谟阁潘公墓志铭》还提到,值荒年,潘畴免税弛租,减轻百姓负担,“民得小康,饥不为害”;时飞虎军“有恃醉挟刃伤人者”,他军法从事,“诛之,于是帖服,无敢犯”;重视教育,“所至必问人材,兴学校”,潭州(今长沙)的岳麓书院和衡阳的石鼓书院,“皆一新之”。

(阿旧,新宁人,学者)